

王國維全集

第一卷

顧廷龍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廣東教育出版社

王國維全集
第一卷
顧廷龍題

王國維全集
第一卷
顧廷龍題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項目

主編 謝維揚 房鑫亮
副主編 駱丹 盧錫銘 胡逢祥 鄒國義 李解民

王國維全集

第一卷

浙江教育出版社
廣東教育出版社

本卷主編 傅傑 鄒國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国维全集. 第1卷 / 谢维扬, 房鑫亮主编; 傅杰, 郭国义分卷主编.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38-8079-8

I. ①王… II. ①谢… ②房… ③傅… ④郭… III. ①王国维(1877~1927)—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2932 号

定價	印數	印次	版次	插頁	字數	印張	開本	印刷	排版	發行	出版	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項目	王國維全集
貳仟貳佰圓(全貳拾卷)	貳仟	二〇一〇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二〇一〇年九月第一版	壹佰陸拾壹	捌佰肆拾肆萬	八九一·五	七一〇×一〇〇〇 十六開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杭州興邦電子印務有限公司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	謝維揚 房鑫亮	杭州天目山路四〇號	
										廣東教育出版社	郵編: 三二〇〇一三			
										廣州市環市東路四七二號	郵編: 五一〇〇七五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8-8079-8

聯系電話 (浙)0571-85170300-80928 (粵)020-87609705

電子信箱 (浙)zjyy@zjeh.com (粵)chenwp@21cn.com

網 址 (浙)www.zjeph.com (粵)www.gjs.cn

出版說明

王國維是我國近代的著名學者。王國維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項艱巨的工程。

一九九六年秋，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的王國維全集項目在多年停頓之後，重新啓動遇到困難，尋求合作的出版單位。浙江教育出版社考慮到王國維是浙江籍的著名學者、教育家，整理出版王國維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對於我國的文化積累有着重要意義，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的全集項目具有資料搜集較為齊全的優勢，決定參與合作，給予全面支持。雙方共同組成編輯委員會，商討編輯方案；共同策劃成立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誠邀王元化先生任主任，傅璇琮先生任副主任，邀請相關學科的著名專家、學者任學術顧問，一九九七年二月在杭州蕭山召開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會議，為全集的整理出版定方針，解疑難。

全集的整理編輯，按『求全存真』的原則進行，分批整理。一九九九年秋，開始部分發排。

在浙江教育出版社與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的合作項目進行的同時，廣東教育出版社約請北京一批學者整理編輯王國維全集的工作也在進行。該項目於一

九九四年開始策劃，主要以趙萬里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為基礎，增收了四種王氏其他著作。二〇〇一年三月，基於節約資源、優化選題、集思廣益、共同開發的願望，浙、粵兩家出版社和滬、京兩方整理者的代表在廣州舉行四方合作會議，同意共同整理出版王國維全集，充實、擴大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和編輯委員會。鑒於滬方項目相對而言具有資料齊全、規模完備的特點，故合作後保留『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項目』的名稱，北京方面的書稿由出版社負責併入，華東師範大學方面的點校人員署『點校』，北京方面的點校人員署『復校』。書稿的編輯校對工作，主要由浙江教育出版社負責完成。

全集的整理、編輯、排版、校對，難度較大，持續十餘年。有的部分，整理者爲了『求全』，在整理過程中仍不斷搜集、補充資料，全書完稿於二〇〇九年一月。全集的排版經歷了排字系統的更新，二〇〇三年之前發排的部分與其後發排的部分爲不同的排字系統，排版效果略有差異，這種情況甚至出現在調整後的同一卷書中。儘管如此，編校人員仍盡全力做好編校工作，並與排版方協調，盡可能把這種差異縮小到最低限度。

本全集的整理出版，是一項在前人整理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創新的工作。王國維去世後，羅振玉整理編輯其遺作，於一九二七年起陸續刊出海寧王忠愍公遺書四

集。其後，趙萬里等復加補輯，於一九四〇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十六冊。一九七六年，臺灣大通書局又作增補，影印出版了王國維先生全集。一九八三年，上海古籍書店據趙氏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影印，更名王國維遺書；一九九六年第二次印刷改為上海書店出版社，影印出版精裝本十冊，是目前通行的本子。本次整理的點校底本，整理者使用了王國維遺書的大部分內容、臺灣大通書局出版的王國維先生全集中的傳書堂藏善本書志（影印臺灣藝文印書館本），及其他出版單位的一些王氏著作，並蒙中國國家圖書館等單位及許多關心、支持這項工作的個人提供資料，使全集的整理漸臻完善。全集二十卷，包括王氏著作（含譯著、校注文字）十九卷，附錄一卷。較之此前的王國維先生全集，增收譯著（約四卷）、水經注校（分上、下兩卷）、書信日記（一卷），及教育學、詞錄、羅振玉藏書目錄、齊魯封泥集存、東山雜記、二牖軒隨錄、閱古漫錄、流沙墜簡（王氏所著部分）、乾隆浙江通志補、經學概論、元朝祕史地名索引、兩漢魏晉鄉亭考等十餘種著作和一些散佚的詩文作品，約佔九卷。在此，我們要向整理王氏著作的前人，向有關出版單位，向提供資料的單位和個人，向關心支持這項工作的王氏故里海寧市的領導和有關單位，表示敬意和謝意！向先後致力於全集整理工作逾三十年的華東師範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的幾代研究人員、整理者，及參與合作完成這項工作的北京方面的整理者，表示敬意和謝意！

全集的整理出版，得到了王元化先生等老一輩學者的親切關懷和熱情支持。王先生二〇〇七年十二月於病中作了王國維全集序。在全集即將出版之際，我們感謝所有給予此項工作以關懷和支持的前輩學者和各方人士，深切懷念已經謝世的全集整理出版工作委員會主任王元化先生及學術顧問方詩銘、吳澤、吳戰壘、胡道靜、袁英光、黃永年、戴家祥、羅繼祖、譚佛雛、顧廷龍先生！

全集的整理出版，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的關懷和支持，先後列為國家『九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九五』、『十五』、『十一五』重點規劃項目；二〇〇九年列為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在此謹致謝忱！

浙江教育出版社
廣東教育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王國維全集序

王元化

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王國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秉持『獨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不仅在歷史考據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同時在西學引入方面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既有以觀堂集林爲代表的縝密的功夫，又有以靜安文集爲代表的恢宏的境界。對於他的學術成就與治學方法，陳寅恪先生早就作了很好的概括：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獯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合，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爲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這無疑是不刊之論。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王氏兼具弘大的抱負與清醒的意識，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發出了難能可貴的呼籲：

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謂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國學叢刊序）

從他的譯文到他的論著，都反映了他融匯中西、博學睿思的努力，這些努力成果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產之一。過去我曾說過：學術不僅如過去的學者所理解的那樣為政治培養人才，更為重要的是它能轉移社會風氣，提高人的文化水平，影響人的素質。而學術上的虛驕浮誇陋習，往往會形成社會上的弄虛作假之風。從這個意義來看王國維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仍足以為我們的榜樣。

王國維的著作曾經多次編集出版，但全面搜集王氏著作、書信、譯著的全集則尚未見。經過多年努力，現在我們有了這部全集，這是值得慶賀的。我也盼望能有更多的學者與出版者來認真從事這樣既無愧於我們的先人、也有啓於我們的後人的踏踏實實的文化積累與傳承的工作。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

前言

王國維是中國現代蜚聲國際的杰出學者，其學規模宏闊，在文史哲各領域均有重大建樹，而遺著流播中外，尤為後人開啓了諸多治學門徑。為更好繼承這份文化遺產，現將多方搜羅的王氏著譯及書信、日記等編為全集，以饗讀者。為方便閱讀本書，茲就王氏學術及全集編纂緣起與要旨等略作說明。

一

王國維（一八七七—一九二七），字靜安、伯隅，號禮堂、觀堂等，浙江海寧人。早年受舊式教育，性喜史書及詩、古文辭。年十六，舉秀才。甲午戰後，受時事刺激，漸向慕新學。一八九八年二月，至上海時務報館充書記，並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補習外語。一九〇一年春，至武昌農務學堂任翻譯。旋受羅振玉資助，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留學，僅四月餘即抱病而歸，從此開始了其『獨學時代』，並先後執教於通州（南通）師範學堂、江蘇師範學堂。一九〇七年起，任清學部總務司行走、編譯圖書局編譯和名詞館協修等職。清亡後，隨羅振玉東渡日本。一九一六年應猶太富商哈同之聘，至

上海主編學術叢編。一九二三年赴京充清廢帝溥儀『南書房行走』。一九二五年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一九二七年六月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王氏治學，初頗耽好哲學、美學和教育學。但不久，就因『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轉攻詩詞創作和文學評論。旋復以從事文學『感情寡而理性多』（靜庵文集續編自序），轉向於兼重實證的文學藝術史研究。辛亥以後，其學術路向再度發生重大轉折，進入了範圍更廣、收獲最爲豐碩的歷史研究領域。觀其一生學術，主攻方向雖屢有變化，但無論治何學，均貫穿着對現代學術的高度自覺。這一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是對現代學術方法論的重視。王氏的學術生涯，始於研治西方哲學，這一經歷使其很早就對方法論有所自覺。一九〇二年以後，他不僅借譯著哲學概論（日本桑本嚴翼原著）簡述哲學研究的演繹、歸納、直覺和辯證等一般方法，還專門翻譯了英國隨文（今譯耶方斯）的辨學，對西方邏輯學作了較爲系統的介紹。並一再向教育界和學術界發出呼籲：『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進步之學問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靜庵文集續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他本人這一時期撰寫的論性、釋理、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等文，便都貫徹了這一主張。而其治學先後涉略哲學、教育、文學、史學、考古乃至自然科學（主要是翻譯國外算學、農藝、動植物等著作）等領域的經歷，更使其對方法論的把握具有一種較爲宏通的特點。

其次是善於跟踪本學科的發展態勢，並依據自身條件選擇學術主攻方向。王氏生平所事學術，固與其個人遭際有一定關係，但從更深一層看，實與其思想深處對學術事業的理解有更大關聯。如於哲學，在經過一段時期的摸索後，他自謂或能在哲學史研究上取得成功，但却難以成爲有創造的哲學家，以爲既不能達到『自立一新系統、自創一新哲學』的境地，則不如另辟學術蹊徑。可見已自覺地把原創性視爲學術事業第一生命。當然，這裏所強調的學術原創性，決非那種專重主觀思想發揮的標新立異，而是要求結合時代提供的新觀念或新材料，提出新理論、創建新學科和解決新問題。如清末以來，隨着西方近代科學理論和方法的輸入，以及大量考古新材料和其他文獻的發現，爲人們重新審視歷史提供了新的手段和依據。對於這一學術發展態勢，王國維自始就有着十分清醒的把握，曾一再強調：『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爲孔子壁中書；二爲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靜安文集續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而這也是他選擇這些領域作爲學術主攻的原因。

三是具有自覺融入國際學術潮流的意識。認爲：『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

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靜庵文集續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並身體力行，不僅通過翻譯，先後向國內學術界介紹了西方近代哲學、邏輯學、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等知識，以及伯希和、斯坦因、津田左右吉、箭內互等的學術研究成果，還和伯希和、藤田豐八、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等東西方學者始終保持了良好的學術交往關係。這對於他及時把握相關領域的最新學術動態，並使自己的研究躋身國際學術前沿提供了重要條件。

四是理性對待新舊各派學術及其方法之爭。晚清以降，圍繞着中國學術的未來走向，中西新舊之學發生過激烈而持久的爭執。王氏早年對此曾持較激進的西學路線，但不久就改取比較理性的態度，並在一九一一年發表的國學叢刊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無』之說。聲稱：『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認為古今東西學術，大致都不出科學、史學和文學三者範圍，治學者雖不免各有偏重，但就學術的發展而論，各科之間又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於科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史學；尚古者，出於史學上之見地而不知有科學。即爲調停之說者，亦未能知取捨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今新舊之說也。』中、西學的來源

固自不同，但隨着風氣漸開，交流既密，其發展也日呈相互推動之勢，故『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此由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彼鰓鰓焉慮二者之不能並立者，真不知世間有學問事矣』。顯見，王氏理想中的現代學術，乃是一種體現了中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以及各學科之間相互會通的開放性體系。這一點，從其方法論中即可得到印證。

王氏治學，早年於西方近代哲學方法用力甚勤，對康德純粹理性批評及叔本華意志及表象之世界等更是反復研讀。在傳統方法的繼承方面，他同樣表現出這種執著的精神，直到民國初年避居日本時，猶以『所學根柢未深』，刻苦研習經學訓詁，『日讀注疏一卷，擬自三禮始，以及他經，期以不間斷』。（見王氏致繆荃孫函）其後期的史學研究，尤具一種新舊兼蓄和中西融通氣象。『二重證據法』的提出便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其說以爲：『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無不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古史新證總論）雖然運用實物史料特別是金石銘文證史，並不始於王氏，宋、清時代的一些金石學家對此均有所關注，但這些金石材料多屬采集品，運用於考史的範圍也比較有限。而

王國維所處的清末民初正值我國近代新史料大發現時期，加之甲骨文、西北簡牘和敦煌文獻之出土都有明確的地點或田野考古學依據，其規模和價值迥非前代可比，這就爲『二重證據法』的施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現代學者論及『二重證據法』，往往十分強調其以實物考史的一面，這對於舊史學專重文獻的治學方法固然有一種糾偏的作用，但這樣的理解，並不完全符合王氏的本意。事實上，王氏的這一方法，針對的乃是當時學術界兩種褊狹的史料觀念：一是輕於『疑古』，如胡適曾認爲，對於三代文獻，『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主張『先把古史縮短二二三十年，從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軌道以後，然後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胡適本人講古史，便祇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逕從周宣王以後講起，（見古史辨第一冊）實際上是認爲東周以前除了考古資料外，其他傳世文獻都不可靠。這也是當時『古史辨』派的基本看法。二是過於信古，如章太炎、黃侃等人因出於對說文和其他傳世文獻的崇信，甚至連出土甲骨金文的史料價值也不願承認。對此，王國維都作了批評，他指出：『汲冢所出竹書紀年，自夏以來皆有年數，亦諜記之流亞；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爲五帝三王盡加年數。後人乃復取以補太史公書，此信古之過也。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僞，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

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爲充分之處理也。』(古史新證總論)並謂甲骨金文等新出之史料，在在與舊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學與經史之學實相表裏，『惟能達觀二者之際，不屈舊以就新，亦不絀新以從舊，然後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於後世』(觀堂別集殷虛文字類編序)。從這種理性精神中，我們正可以體會到其倡導『學無新舊』的深意之所在。

王氏治學的上述特點，不僅使他受到了當時新舊各派學者的一致推崇，也爲其學術上的巨大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一

王國維在諸多學術領域都有重大創獲，今就最具原創性者，略加評述如下。

(一) 文學及戲曲史研究

王國維在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有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等。一九〇四年刊於教育世界的紅樓夢評論是我國第一篇以西方美學觀點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它突破了點評、索隱或隨筆等傳統形式的局限，以現代論文形式對文學創作及其特點作了深刻闡述。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之間發表於國粹學報的人間詞話是詩學領域中一部總結性著作，其所創『境界』說和圍繞此核心觀點展開的

『造境』和『寫境』、『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等一系列具體闡述，構成了一套較完整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理論，受到學界高度評價。

戲曲作爲一種民間藝術，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素爲學術界忽視，王國維首先將它納入學術領域，使之成爲專門學問。在多年資料積累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撰成於一九〇三年的宋元戲曲史首次對我國古代戲曲史進行系統研究。該書界定和論述了我國戲曲的藝術特徵，勾勒了其起源及發展脈絡，對以元雜劇爲代表的戲劇之時代特點——表述自然與悲劇美予以高度評價，認爲可與世界大悲劇比美，並對其形成原因作了深入探索。王國維的上述研究，雖不無缺陷，如紅樓夢評論有比附之處，宋元戲曲史重戲曲文章而輕結構和演出技藝等等，但筆路藍縷，開辟之功無人可及。

（二）甲骨金文及殷周史研究

甲骨文自一八九八年現世後，雖相繼受到過王懿榮、劉鶚、孫詒讓等學者的關注，但真正具有突破意義的研究則始於羅振玉和王國維。王國維對『甲骨學』的貢獻，在文字審釋方面較羅氏續有推進，撰有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考釋，羅氏的殷墟書契考釋和殷墟書契待問編對其考釋成果也有不少吸取；更爲重要的是以甲骨金文材料與傳世文獻相參證，深入研討殷周古史，取得了前無古人的突破性進展。其一九一七年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兩文，系統釐清了殷王室世系，有力地證實了史記